

中国当代诗论 50家



古远清 著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致中
封面设计：邵大维

中国当代诗论50家

古远清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25 插页：5 字数：370千
1986年9月第一版 198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700

书号：10114·251

定价：3.15元



作者近影

作者小传

古远清，1941年生，广东梅县人。1959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1964年毕业。先后在湖北大学、中南财经大学任教。现为中国散文诗学会常务理事、湖北鲁迅研究学会理事、武汉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湖北分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湖北分会会员。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艺术欣赏——〈呐喊〉〈彷徨〉探微》（湖北教育出版社）等。

诗苑争鸣五十家 (序)

臧克家

诗论，是诗人、诗论家对诗歌问题观点和意见的论述。由于思想、经历、修养与爱好的不同，对于诗歌问题见解有差异，乃至矛盾、对立，这是很自然的。有的大同而小异，有的小异而大同，有的则针锋相对。这样，诗歌论坛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我，开国半年之前就到了北京，对于诗歌方面争鸣的情况，略知梗概。主要论争围绕着以下这些问题展开：格律诗与自由体诗的论争；古典诗歌、五四新诗传统的批判继承与侧重向外国诗歌学习的论争；写社会主义现实生活还是向个人内心挖掘的论争；诗歌应该民族化、大众化还是偏向晦涩、古怪难懂的论争；诗人到群众中去还是只凭个人灵感写作的论争；新旧体诗应该并存，还是互相排斥的论争……这些论争，是涉及诗歌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大问题；各抒己见，比较研究，使群众鉴别其正确与否，从创作实践中印证其得失。有些问题一时难以判断其谁是谁非，两说可以并存。

意见分歧，是非不一，当代诗论有五十家。但试问，在这些家数之中，在争论的各个方面，是否有一条标准线可以衡量呢？

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有的。在某个历史时期，呼应了时代的要求，表达了广大群众对诗歌的希望与要求的，应该积极肯定；背离了这两方面要求的，就不甚可取，或不可取了。突出一例：“崛起”论一出来，就受到群众的批评，因为它既违反了诗歌发展的规律，也与当前诗歌创作的情况背道而驰。当然，每一家的论点，须经受时间的考验，真理也可能在少数人手里。我们的诗论，追溯既往，着重目前，还要放眼未来。要研究创作情况，顺应时代与人民的需求，对各种问题共同进行研讨，既存异又求同，以促进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诗歌的兴旺与蓬勃发展。

我的理论基础很差，对诗歌问题没下过研究功夫，对当代各家的议论虽知道一些，只是一斑一点，未窥全豹。最近，忽然收到从未识面的古远清同志远道寄来当代诗论五十家的专著稿件，一大厚本，真有点触目惊心，拿在手里，觉得它的分量太重了！我耐心地翻阅了一下，渐渐引起了我的兴趣，紧张心情消失了。把三十几年来的几十家诗论，经过消化大量材料，一一为之理出个头绪，而且予以介绍、评述，这需要多少时间、精力和耐心呵！它不仅是一本资料汇编，给人方便；而且凭比较科学的态度，对各家诗论综合起来加以评述，在评述时，就有作者的观点意见存乎其中。我看，他的态度，是不偏不倚、比较公正的，但并非没有是非感。

我觉得，从事诗歌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同志们，是需要这样一本书的；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年诗歌爱好者从这本诗论中也可以窥见三十五年来诗歌的发展以及对各种问题争论的情况。古远清同志从事这份工作的认真精神，是值得赞扬的；他作出的成绩，我觉得是很有益的。

1985年4月1日

目 录

诗苑争鸣五十家(序).....臧克家(1)

中国当代诗论三十五年——代前言.....(1)

劳 辛.....(26)	苗得雨(158)
亦 门.....(34)	冯 至(165)
天 鹰.....(47)	易 征(173)
臧克家.....(51)	杨匡汉(179)
沙 鸥.....(64)	郭小川(188)
何其芳.....(71)	孙克恒(199)
冯中一.....(85)	李元洛(207)
晓 雪.....(89)	尹在勤(217)
公 木.....(99)	谢 冕(224)
安 旗(107)	吴欢章 孙光萱(239)
田 间(118)	艾 青(246)
袁水拍(127)	雁 翼(258)
沈仁康(136)	阿 红(263)
凡 尼(143)	骆寒超(269)
徐 迟(148)	吕 进(281)

公 刘	(289)	李 季	(385)
周良沛	(299)	张光年	(392)
流沙河	(306)	闻 山	(399)
丁 力	(317)	宋 垒	(406)
林 庚	(326)	毛泽东	(414)
邵燕祥	(335)	贺敬之	(427)
卞之琳	(345)	柯 蓝	(436)
郭沫若	(354)	孙绍振	(444)
王亚平	(367)	任 愆	(453)
邹荻帆	(376)	谢文利 曹长青	(461)

当代诗论应该有更活跃的前景——关于本书的写作答客问

(代跋)(467)

附录：中国当代新诗研究著作目录(474)

中国当代诗论三十五年

——代前言

中国当代诗论，是中国当代诗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看待它的发展，是一个随着中国当代诗史、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建设而提出来的问题。

在我国当代，既有群星灿烂的小说家和成就突出的小说评论家，也有一批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有真知灼见的诗歌评论家。可是，在我们已经出版的当代文学史中，涉及新诗评论的部分很少，有的甚至完全没有提及。我们的好些同志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一个时代诗歌创作的繁荣，不仅以那个时代的诗人为标志，而且以那个时代的诗歌评论家为标志。研究有建树和有影响的诗论家，把他们的著述介绍给广大读者，其意义决不可低估。通过回顾当代诗论所走过来的道路，总结它的经验和教训，是有助于推动今后诗歌理论的发展，促进今后诗歌创作的繁荣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虽然出现过闻一多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①、孙俪工的《新诗作法讲义》^②、胡怀琛的《新诗概说》^③、冯瘦菊的《新诗和新诗人》^④、石灵的《新诗歌的创作方法》^⑤、蒲风的《抗战诗歌讲话》、《现代中国诗坛》^⑥、艾青的《诗论》^⑦、徐迟的《诗歌朗诵手册》^⑧、王亚平与戈茅合著的《诗歌新论》^⑨、李广田的《诗的艺术》^⑩、冯文炳的《谈新诗》^⑪、

黄药眠的《诗论》^⑫、任钧的《新诗话》^⑬、朱自清的《新诗杂话》^⑭、祝实明的《新诗的理论基础》^⑮、吕剑的《诗与斗争》^⑯……等众多以谈新诗为主的论著，但总的说来，它与当时新诗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相比，还是极不相称的。

当代诗论在现代诗论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就它的主体（即新中国诗论）而言，它是我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我们一共出版了两百余部有关新诗的论著或评论集（其中个人写的约占一半），就内容而论，它们绝大部分都是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诗歌理论，在我们当代诗论中是主流、主体。这其中不乏有份量的力作。但是，从整体上看，我们还没有一本用马列主义观点写成的内容丰富，系统性强的中国诗学著作^⑰。在已有的诗论著作中，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也只占少数。我们已有了一批以写诗论著称的评论家，但比起小说评论家来，数量还嫌太少。许多人写诗论，不过是从事创作或从事别的体裁评论的副业。这种情况的形成，不能过份责怪评论家。应该看到，这主要是因为当代诗论所走过的是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它时而活跃，时而沉寂；时而前进，时而停滞；时而潮高，时而汐落。下面，且分三个时期概述当代诗论在各个阶段的不同特点。

一 当代诗论的创业期(1949.10——1965)

建国后的十七年，是当代诗论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7上半年）和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1957下半年——1965）这两个小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急风暴雨中诞生，从此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新的时代，要求诗歌理论的建设为社会主义新

诗的成长壮大鸣锣开道。用马列主义诗学观战胜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诗学观,力争为工农兵服务的诗作在诗坛站住脚跟,是建国初期诗歌理论建设的首要任务。1949年7月成立的上海诗歌联谊会的章程中,曾作过这样的规定:

(一)建设科学的诗的理论;

(二)肃清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及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诗歌理论和影响。

这种规定,是上海的诗歌工作者所遵循的,也是全国革命的、进步的诗歌工作者所遵循的。翻开当时的报刊,我们可以看到,宣传马列主义的诗学观,论述“五四”以来的新诗的革命战斗传统,划清无产阶级革命诗歌与资产阶级诗歌的界限,反对诗歌脱离政治、脱离人民,提倡通俗易懂的诗歌,反对单纯追求形式、追求小资产阶级庸俗趣味和粗制滥造的公式化倾向,是当时诗论建设的主要内容。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抗美援朝斗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卓有成效。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和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给作家和评论家带来艺术民主,使诗论家有较多的选择自己批评视角的权利,自由讨论的空气较浓。在这一时期,对诗人诗作或诗论的批评,虽然也有简单粗暴的倾向,但大多数诗论家还不至于象契诃夫小说中写的普里希别夫中士那样:满脸长刺,自以为是法规的化身,到处干涉与禁止。在1956年初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诗歌组召开的讨论会上,诗人艾青、臧克家、吕剑、力扬、郭小川在会上对当前诗歌创作问题展开了面对面的争论。不少人在发言中,对部分老诗人的近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同时,诗人们之间也互相展开批评,检讨创作。这种严肃的精神对推动创作的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诗论,成绩与缺点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一

个突出成绩是为诗人们改造思想，转移立足点作了许多工作。当时的诗论一再强调：诗人要“表现新中国，表现爱国主义”，成为工农兵的代言人，就必须转移立足点，与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没有正确的写作立场，思想感情不向无产阶级靠拢，就会写出“抱着爱人的膀子，唱战斗的颂歌”那样不伦不类的诗来。

这种从属思想改造和“把诗歌活动紧紧地与政治任务配合起来”^⑩的诗论，不可否认，它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为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诗论体系作了披荆斩棘的工作。但有得也有失，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教条主义诗论的盛行。当时不少诗评文章，均是以一般的社会学方法去研究诗歌创作实际，不大重视从诗的艺术规律出发去探讨新诗理论问题。从1951年对卞之琳《天安门四重奏》等诗作的批评以及1955年对何其芳《回答》所作的措辞尖锐的批评，便可说明教条主义的诗论是最容不得抒写真情、有自己独特个性的诗篇的。它热衷的是用政策条文框架去束缚诗歌。

其次，是大力提倡抒人民之情，反对诗歌脱离时代和人民。1956年，周扬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上作报告时提出：

我们需要的是人民的诗歌。我们的抒情诗，不是单纯地表现个人情感的，个人情感总是要和时代的、人民的、阶级的情感相一致。诗人是时代的号角。……抒情是抒人民之情。这就是我们的抒情诗的基本特点。

这些观点是正确的。肖殷等理论家曾写了文章加以响应。他们一致认为，“抒人民之情”，就是要求诗人把诗歌创作看作是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的一部分，要使自己的诗篇反映出亿万人民群众的思想、情绪和愿望。五十年代中期出现的许多优秀诗篇，正是

在“抒人民之情”的理论指导下产生出来的。当然，抒人民之情与诗人的艺术个性并不是对立的。相反，抒人民之情只有通过诗人的个人之情去体现，才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但当时在解释抒人民之情时，没有很好强调诗人独特的感受的重要性，致使那些假抒人民之情之名直着喉咙叫喊的作品受到首肯。另一方面，有的文章把抒写真诚的友谊，纯洁的爱情，对故乡的眷恋的情感排斥于抒人民之情之外，这就把抒人民之情的范围划得太窄了。但我们否定这种解释的片面性的时候，不应该导致对“抒人民之情”这一原则的否定。

再次是颂歌原则得到了确立^⑩。五十年代，诗人们写作了大量的歌颂新中国，歌颂劳动和建设，以及歌颂党和领袖的诗歌。这些诗歌，取代了旧中国诗人所写的痛苦之歌、诅咒之歌，它们是写得那样真诚和发自内心。随着颂歌的勃兴，便约定俗成地确立了这种颂歌的原则：新中国诗人的天职，就是歌颂祖国和人民，礼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如果要暴露，那暴露的只能是阶级敌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或帝国主义分子对新中国的敌视和攻击。颂歌，只能对我们的时代充满喜悦感，对我们的生活抱着无限的信心和希望。它的色彩，只能是热烈的，其风格也只能是爽朗的。这些看法，大体是正确的，但还不全面。就题材来说，不能光有颂歌，也还应有战歌、哀歌。就颂歌的风格来说，也不能只有明快激昂的，也还应有悲壮慷慨的，绮丽婉曲的，雄豪恣肆的，自然隽永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看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看到无论是我们的制度还是我们的新生活还有缺陷和不足。正如郭小川在当时的一次发言中所指出：诗人在唱颂歌时要看到矛盾和冲突。“我们的诗如果不能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只一味地叫喊伟大、伟大，也只能是表面的轻浮的‘歌颂’。只有表现了这种矛盾和冲突，歌颂才有力量。对那些落后的反动的东西的

憎恨也才会深”^②。

第四，对新诗的民族形式展开了多次的讨论。1950年，由《文艺报》组织了新诗歌问题笔谈，田间、肖三、马凡陀、冯至、林庚等人都写了文章。不同意见虽未正面交锋，讨论也没有进一步深入下去，但多数文章均强调：新诗要能做到被人记住，必须注意形式问题，理想的办法是建立一种形式。第二次是《光明日报》在1951年年初展开的五、七、九言诗的讨论，参加者有林庚、竹可羽、沙鸥、蒲阳。以后上海《人民诗歌》编辑部同人屠岸、劳辛等也联合写了《对于诗歌表现形式的初步意见》^③，不同意林庚提倡九言诗的做法，认为五、七、九言均是同一类型的诗，它们在表现新生活上有困难，必须加以突破。第三次讨论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组织的，时间是1953年12月至次年1月。这次讨论比上一次深入，中心议题是争论自由诗与格律诗的优劣问题。在这次会上，卞之琳正式提出了他关于新格律诗的主张（何其芳在此前一个月写的《关于写诗和读诗》的文章中，也提出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第四次讨论是1956年8月至次年初，由《光明日报》1956年8月5日发表朱偰的《略论继承诗词歌赋的传统问题》所引起。此次争论涉及到诗词歌赋能否反映现代生活，现代口语与诗词歌赋的形式存不存在着矛盾，以及如何理解民歌传统和估价“五四”以来的新诗等问题。

在这一时期，特别是五十年代前期，不少新老诗论家，在论诗时都不同程度受过苏联当代诗论家武尔贡、伊萨柯夫斯基的影影。他们强调诗的时代性就是指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我们的党和人民的思想，以及强调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就是诗人的形象等等，都可以从苏联的文艺理论中找到依据，特别是伊萨柯夫斯基《谈诗的技巧》，对他们影响更大。

在这一时期，老诗人郭沫若、冯雪峰、艾青、臧克家、亦门、

田间、公木、沙鸥、劳辛，都积极从事新诗的理论建设工作。其中有的找到了自己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如亦门出版了《诗是什么》，臧克家出版了《在文艺学习的道路上》，沙鸥出版了《谈诗第二集》，公木出版了《谈诗歌创作》。特别是何其芳，他研究诗歌的艺术特征和现代格律诗，使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理论个性的研究对象，因而为当代诗论的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有的则未能很好找到自己的理论“立足点”，如艾青在这时期写的普及性的或论争性的文章，就未超过他解放前的《诗论》的影响。有的则因政治气候的多变未能找到自己的理论“立足点”，或虽然想寻找“立足点”，却被繁忙的行政事务所羁绊。如劳辛在1950年出版的《诗的理论及批评》的后记中就说：“关于诗的科学理论的系统的著作目前太少”，曾想用“新的观点写一本有系统的理论的小册子”，后未能实现。其他在解放前曾出版过诗论著作的汪静之、穆木天、黄药眠、王亚平、李广田、吕剑、任钧等老诗人，也未能调动自己的全部艺术积累，为新时代写出新的诗论著作。但“江山代有才人出”，这时期出现了丁力、闻山、晓雪、安旗、沈仁康、宋垒等新的诗评家。

1957年反右斗争后至1965年，是新诗创作充满曲折和反复，也是新诗评论历尽起伏和回转的一个重要阶段。

自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新诗评论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活跃局面。毛泽东本人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诗“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的看法，从此结束了新旧诗对立的局面。许多诗人和诗论家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解放思想，大胆冲破“禁区”，思考、研究如何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诗歌创作的各类问题，发表各种对诗歌理论的探讨和诗人诗作的评价文章。如老诗人李白凤在《人民文学》^②发表了《写给诗人们底

公开信》，旗帜鲜明地反对题材决定论，不能只许唱颂歌，还可以唱别的歌，强烈要求扩大新诗的表现领域：“我感觉到诗歌的创作被限制在如此狭窄的领域里，诗人们替自己划定了写作范围，就在这样的小天地里回旋着。”话虽然说得有点激烈，有些判断也还可以进一步推敲，但当时题材单调和风格远不够多样化，却是铁的事实。新兴起的《星星》，坚决反对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在《编后记》中认为“谁要偏爱着”单弦独奏，“只准抒某一种情，那也只能说是一种怪癖。”丘尔康、沈仁康、平平（果冀生）也大胆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主张揭示人们丰富的感情世界，批评了创作和评论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当时人们的思想也真够解放，写文章毫无顾忌，而不象后来那样瞻前顾后。当1957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在“什么话”栏内转载了流沙河的《草木篇》并发表了详细的编者按后，7月河北出刊的《蜜蜂》杂志还发表了为《草木篇》辩护的文章，认为对《草木篇》等作品的批评不够实事求是，实行的是“扣帽子主义，人身攻击主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死敌。”所有这些，和艾青、张贤亮、邵燕祥、公刘、流沙河等人的揭示现实生活中矛盾冲突的诗作出现，形成了当时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互相推动与促进的良好势头。

然而，这种大好局面未能维持多久，即被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阴云所覆盖。这时，饱经风霜的老诗人所写的论著如艾青的《诗论》（增订本），公木的《谈诗歌创作》，以及诗评新秀晓雪的《生活的牧歌》遭到口诛笔伐。李白凤更是成了众矢之的，从此在诗坛上消声匿迹。文艺界在批评刘绍棠的文艺思想的同时，沈仁康受到了株连。前几年在诗坛上初露锋芒的青年诗论家叶橹被剥夺了发言的权利。雄心勃勃、计划编写多卷本《中国现代诗史》的骆寒超这棵小苗，未及出土即被除掉。影响所及，使有的诗论家惯用政治评判去取代对作品的美学分析。稍后出现的对王瑶《中国新

文学史稿》诗论部分的抨击，对郭小川《望星空》的批判，对穆旦、蔡其矫、秦似、丁芒诗作的责难，尤其是《谈诗第三集》以及《论抒人民之情》这二本小册子对“右派”诗人的批判，均说明早先受到苏联“拉普派”影响、在批判“胡风集团”中初露端倪的诗歌评论的极左思潮，在这段时期内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虽然和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所煽起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有所区别，但也不是毫无内在的联系。

1958年，随着新民歌“千箩万箩”、“车载船装”地占领了各种报刊和宣传阵地，诗歌评论在这段时间内也曾相当活跃了一阵。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首先发表了中国新诗要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的意见。他要求新诗必须民族化，从方向上来说是对的，但实践证明，这种提法还不够完善。过后，在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②的带动下，全国许多报刊都开展了关于新诗发展道路问题的讨论。与此同时，还展开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问题的讨论。不少诗人、诗论家，还有广大的工农兵，都对新诗的发展道路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天鹰、沙鸥、李岳南、安旗还出版了论述新民歌的专著或论文集。这类有关新民歌的小册子，多达近40种。它们均表现了诗人和诗论家迫切希望新民歌能为新诗注进新鲜血液，促进新诗民族化、大众化的良好愿望。但当时的许多文章，没抓住新诗的问题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这一关键；另一方面，这些文章也不能不受当时那种违背客观规律，沉醉在一步就可登上共产主义天堂的“左”的思潮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把毛泽东指出的新诗发展道路，看作是唯一的道路，表现在把新民歌拔高为“共产主义文学的萌芽”，把说大话看作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同义语，以及责令诗人东施效颦，改变诗风。对这种“左”的倾向，评论界有一定程度的觉察。且不说何其芳、卞之琳、雁翼等著名诗人对这股风有所不满，单拿不是